

文史英华：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文存

(上、下卷)

陈自仁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史英华：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
文存 / 陈自仁主编. --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4
ISBN 978-7-226-04425-4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文史资料—甘肃省—文
集 IV. ①K29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2609号

责任编辑：马海亮
封面设计：王林强

(上、下卷)

文史英华——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文存

陈自仁 主编 袁永朋 副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张 43.5 插页 6 字数 850千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978-7-226-04425-4 定价：180.00元

《文史英华——甘肃省人民政府
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文存》
编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张正锋

副主任：李汝根 李佩芬

委 员：陈自仁 袁永朋 尚建荣

王世江 王怀钦 李 萍

序

甘肃省副省长 张广智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各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是中西文化交汇的要道，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资源大省。

早在 8000 年前，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结合部的甘肃一带，就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新石器时代，众多的族群在甘肃这块地形复杂、山川雄伟的大地上生息繁衍，人文始祖伏羲、女娲诞生于兹土，周秦先祖从这里走向中原。甘肃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资源丰富度排名全国前五位，其中古文化遗址 7000 多处，古文化类型近 10 个，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更是闻名中外。全省出土汉简 6 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 82%，现存各类石窟寺 337 座，被誉为“石窟艺术之乡”，现存明代长城里程居全国之首，民歌“花儿”被列为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省内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遗存异常丰厚。此外，还有东乡、保安、裕固等三个独有的少数民族文化。甘肃众多的文明古迹集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艺术性于一体，极具个性和特色，堪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

甘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滋养了无数的先贤圣哲、志士仁人，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生息繁衍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搜集、挖掘、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甘肃地域文化，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建馆 60 年来，一直主要致力于甘肃地域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大文史研究工作者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巩固扩大党的统一战线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鸿学硕儒、文坛耆宿于斯汇集，社会显达、专家名流于斯荟萃。从 1953 年建馆至今，文史馆先后聘任近 300 名馆员和研究员，一大批在文史研究和艺术创作等方面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以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深入挖掘整理，加强历史研究，发表了数以千万字的论文和专著，出版了大量文集。这些著述，大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其中部分作品荣获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同时，文史馆积极组织馆员和研究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文化交流，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祖国传统文化和甘肃地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甘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集雪泥鸿爪、凤毛麟角，奉后土高天、秦水陇原。今年，适逢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建馆 60 周年，文史馆组织力量编纂了《文史英华——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文存》一书，选取近百位馆员和研究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展示文史馆阔步前行的足迹。书中文章，充分展示了馆员和研究员的才情学功，其内容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对甘肃地方文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文化等方面的搜集、抢救、整理、研究、保护和弘扬，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甘肃文化大省建设也具有弥足珍贵的资政价值。

甘肃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给文史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营养，也

给文史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前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准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给全省文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奉献社会的难得机遇。我相信，省文史研究馆及其馆员和研究员，一定会不负历史重托，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在文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中取得更多的成果，为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发展和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2013年3月于兰州

目 录

上卷 文史研究

孙承宗与袁崇焕

——一叶明史的反思	师 纶
我国主体民族与边沿民族的形成及甘肃南部氏族政权的建立始末	马 通
敦煌石室医药文献类萃	张绍重
宋元时期整理《战国策》的巨大成就	
——兼对鲍彪整理《战国策》再评价	霍旭东
浅谈中外古史的综合研究	
——史学实现自身价值问题的一些思考	水天长
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战争与“香妃”事迹	马德璞
移植与变异:日本《酒茶论》与敦煌《茶酒论》的比较研究	
——兼论转型期的敦煌文学研究新拓展	张鸿勋
论“徙民实边”不是屯田	刘光华
山川肖形神 纪行蕴人文	
——杜甫在陇右的行吟	林家英
蒙古族源诸说述评	樊保良
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及对后世的影响	裴正学
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	赵逵夫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的价值	汪受宽
诸葛亮的廉政思想与实践	张崇琛
略论兰州黄河铁桥	刘过之
经与经学答问	张文轩
盛唐筑就的文化长城	陆庆夫
西汉纸张与纸质档案述论	张克复



寂寞长安烟雨痕	杨立强
中国古玉龙形象的演变及其寓意	陈自仁
汉代的纸与造纸	杨惠福
青城文化辉煌原因之研究	李青惠
从两首诗看中西方诗教的不同	杨文豹
陇南古代经济暨历史上流通的货币	刘可通
关于半坡彩陶刻划文字的一点意见	王文本
电视是影响人类精神生态的重要环境	刘 忻
论打油诗	尹占华
再论王道士	雒青之
《黄帝内经》中的养生之道	
——兼谈中医养身之道的艺术美	张士卿
甘肃新生代气候环境变化与哺乳动物群演替	颀光普
浅谈孙中山及其思想对于当代的意义	韩甦毅
今天的绿洲较古代绿洲大大缩小了吗?	
——对于历史时期绿洲沙漠化过程的若干新认识	李并成
盐场堡往事说未休	李世嵘
中华文化视域中的“多民族文学史观”	朱广贤
论美育与人的素质的提高	秦理斌
《四库全书》编纂与中国古文献之劫难	郭向东
我国古代氐羌族群的原始文化形态探微	杨士宏
岐伯考证与岐黄文化研究	安定祥
伏羲文化研究与伏羲学科建设	伏俊琰
美国罗斯福家族与敦煌莫高窟	王冀青
1949 年以前的花儿与花儿研究	
——《花儿学术史》研究之一	张君仁
华夏文明视野下的甘肃历史文化资源	田 澍
清代史学家张澍五种方志著述论略	漆子扬
隋代甘肃的人口	尹伟先
文化大省建设与甘肃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选择和有效途径	杜播升
敦煌医学的概念、学术价值、研究方向及展望	李应存

下卷 艺术研究

论书法功	黎 凡
我与西部高原画派	杨志印
浅论国画中题画诗的诗情画意	唐俊卿
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源头、母体和通脉	李正宇
对中国人物画造型特色的认识	杨国光
掌握笔法的基本规律,变中求变	
——浅谈黄宾虹《五字诀》	张敬群
论造型基础在中国人物画中的重要性	李葆竹
试论汉画的艺术特色	廖国柱
为山禽传神 为野卉写照	
——莫建成艺术笔记摘录	莫建成
也谈敦煌画派	赵春林
敦煌壁画临摹的意义和功绩	段兼善
涂鸦絮语	沈风涛
立足本土 走向当代	
——对甘肃当前中国画创作的几点思考	陈天铀
思变创新 异帜独擎	
——论甘肃秦腔耿派花脸创始人耿忠义的表演艺术	阎仲雄
在黄土深处培植艺术之根	张改琴
说马	刘大林
一生辛苦为花忙	周玉兰
陇上书风思考	林经文
说艺术的执著与境界	马 江
兰州碑林的两幅李白书法碑刻	王会绍
漫画创作要提高艺术层次	苏 朗
中国书法的中和之美	王得诚
兰州唐琰《松石斋印谱》研究	钱墨君
往事如烟忆四老	张化麒
管窥玉印	李雅成
我以我心写西部	李秀峰



中国山水画的意向与笔墨语境	蒋宜民
我们创作 我们快乐	赵玉华
怎样才能练好书法	赵振元
书画家提高自身修养是当务之急	金耀伟
论对梅的理解、认识和画法	王秉云
修身养性书画外 心任纵横笔墨情	
——浅谈书画人于书画之外修身养性及笔墨精神修炼	吴映宏
浅谈青少年书法教育的几点要领	赵吉庆
谈四“宁”四“毋”理论对当代书法的影响	陆元新
瀚海情	
——大漠系列艺术创作随笔	王 宏
书法三段说	焦玉洁
画外谈艺	
——对三位陇上画家的感悟	张振兴
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构成元素	
——文字作为书法艺术表现的意义	陶劲涛
学画杂感	连克强
传统文化与山水画创作	管 玉
后记	

上
卷

文史研究



孙承宗与袁崇焕

——一叶明史的反思

师 纶



师纶，生于1925年2月，河北省徐水县人。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1948年毕业于师范学校，旋入华北大学。1949年参军，随军进军大西北，参加解放兰州、银川等战役。1955年底，部队集体转业，先后在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做秘书工作。1959年下放甘肃省农机学校任语文组教研组长，1980年调回兰州，在甘肃省京剧团任编剧，后调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甘肃省委统战部工作，曾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秘书处处长。

明朝初年，为安置居于吉林附近穆稷河流域的女真族，置建州卫，岁一朝贡。又增置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之长（即清朝之肇祖），后逐步移至兴京（今辽宁新宾），又向西发展，与明朝有贸易互市，也时有瓜葛，渐至争战频仍，双方角逐于山海关外至锦州一带。明朝廷即设辽总兵或经略、督师，率兵以制之。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开始，陆续在此任统兵主帅者有李成梁、杨镐、熊廷弼、王化贞、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袁崇焕、高第、洪承畴等。其中当以孙承宗、袁崇焕功绩最著。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今河北省属）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第二名，授编修，进中允。熹宗即位（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熹宗称赞他讲得最好。当时，明朝与建立后金国的努尔哈赤，经过萨尔浒战役（1619年）和辽沈战役（1621年）之败，辽沈形势吃紧，朝中因孙承宗知兵，推荐他前去主持兵事，



熹宗不捨。但孙承宗却对辽沈形势十分关心，上书指出当时兵事之弊说：“近年兵多不练，饷多不覈。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于朝。”“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这是他以文官立场提出重武将之权的建议。又提出“抚西部、恤辽民、简京军、增永平（今河北卢龙）大帅、修蓟镇（今北京市蓟县）亭障、开京东屯田数策。”得到熹宗的“褒纳。”他还提出对失职的边帅熊廷弼、王化贞等进行惩办，使“朝右耸然”。

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今辽宁北镇）战役，明军又被后金打败。这时辽东经略王在晋等要在山海关外再筑一道重关，其下属诸将袁崇焕、沈荣、孙元化等不同意，向朝廷报告，朝廷一时不能决定。孙承宗自告奋勇前往察看定夺。他到后，经过实地考察，以充足的理由否定了在山海关前修筑重关的意见，提出坚守关外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及觉华岛（兴城县南十二里海中）。回朝面奏王在晋不胜任，自请前往督师。遂于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他到达后，采取稳固防守，逐步推进的战略方针。招募、组训以辽人为基础的军队十一万，“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守城战具）、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其车营创造性地将战车与火器结合在一起，成为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兵种，并撰写“车营百八扣”的军事著作。这些基本建设，使辽东形势大为改观，后金未敢轻易进犯。正当他准备发动进攻，恢复失地之际，朝廷内部却发生了变化，阉党头子魏忠贤利用熹宗年幼贪玩的“机遇”，把持了朝政。魏对功高誉隆的孙承宗先施以拉拢手段，派其党徒携神炮、甲仗、弓矢及十万白金前来劳军，实际是窥探虚实。孙承宗听到消息，立刻给皇帝上疏说：“中使（太监）观兵，自古有戒。”而后对前来的中使又冷漠待之。魏忠贤因拉拢不成，便施以打击。孙承宗计划进兵，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魏忠贤把持的朝廷兵部和工部勾结起来“相与谋曰：‘饷足，渠即妄为，不如许而不与，文移往复稽缓之’。”这就使不得进兵。天启五年，又“以简将、汰兵、清饷三事责承宗奏报”，实际是进行刁难。孙承宗考虑到自己所上“抗疏帝未必亲览”，便请以给皇帝贺寿的名义，向皇帝面陈机宜。即仅带幕僚一人进京，阉党闻知，即造谣“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魏忠贤“绕御床哭”，使熹宗心动，阉党即矫旨称：“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发三道飞骑阻止承宗入京，又谕京城九门守阉“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孙承宗行至通州，闻命只得返回汛地。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孙的部将马世龙误信降人之言，盲目进兵，“遂有柳河之败，死者四百余人。”“于是台省劾世龙并及承宗，章疏数十上。”承宗不得不知难而退，上书请辞。天启五年十月，致仕还乡，朝廷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之。这是他第一次督辽，尾首四年。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历任邵武知县、兵部职方主事。天启二年广宁之败后，袁崇焕不通知任何人，即单骑驰至辽东，历阅关内外，回来声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朝廷遂超擢为佥事，监关外军。时辽东统帅、经略王在晋令他赴前屯（今辽宁绥中县西南五十五里）安置辽人的失业者。但他并不完全遵王在晋的命令。斯时正值孙承宗首次行边，袁即向他请求以五千人前驻宁远，得到首肯。袁到后，大筑宁远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次年竣工。袁崇焕与满桂“誓与城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至天启五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计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这使宁远成为内地。十月，孙承宗罢去，以高第代。高第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命令全部退入关内。袁崇焕力争不可，便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便只留宁远一城，“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

我退敌进，后金见高第容易对付，便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率大军西渡辽河，围攻宁远。袁崇焕“清野以待”，率众坚守，“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建州兵只好败退，努尔哈赤亦受伤，之后不治而死，皇太极继位。袁崇焕趁势“渐复第所弃土地”，明朝廷尔后便擢袁崇焕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辽东巡抚，“以关内外尽属崇焕。”但魏忠贤却多方掣肘，适逢各地媚魏为其建生祠，袁崇焕不得已，只好效全国所为，也在辽东为魏忠贤建生祠，却“终不为所喜。”天启八年（1628年）五月，后金围锦州，守将赵率教坚守待援，而在宁远的袁崇焕也被后金围困。后金兵退之后，魏党以袁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不得已，提出乞休。同年七月得允，以王之臣代之。

未几，熹宗崩，庄烈帝崇祯即位。崇祯开始颇想有所作为，先诛杀了魏忠贤，“削诸冒功者。”崇祯元年（1628年），任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同年八月，袁到宁远，平息了因缺饷发生的兵乱。给朝廷上疏说：“臣以书生从督师辅臣孙承宗后，力主恢复，……逐步而前，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其议创于承宗，臣因之。”这是按照孙承宗规划的思路守辽东，可谓“萧规曹随。”

孙承宗督辽之前，原为宰辅，居庙堂之高，看的是全局。特别是他早年就“往来飞狐（今河北蔚县）、拒马（河名，源于河北涞源县）间，直走白登（在今山西大同东），又从紇干（山名，在山西大同东），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问险要阨塞，用是畅晓边事。”崇祯四年正月，他出关东巡，抵松山、锦州。又“西巡周遭边寨几千里，皆俘虏（后金）出入残破之地，山谷崎岖，扶掖登顿。经边堡台墙，询问冲缓，器有无，哨近远，尖夜老卒往往能置对，而将领眊然无以应。”这种实地考察之功，在明朝当时的大臣中，无第二人。所以他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八条建议，崇祯看了，十



分赞赏，“严谕饬行。”孙承宗还善于识别人才，团结使用人才。他一到辽东，就对马世龙、袁崇焕、满桂、赵率教、何可纲等提拔重用。他们不仅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战将，且都是忠贞不贰的。满、赵、何最后都在战场上殉国。他对于诚心归附的降将，也放手使用。如降将刘爱塔，归降后改名为刘兴祚，“领降虏亲兵二百，辽骑六百，拜公马前”，后奉命与后金血战，“斩首六百级”，不幸被流矢死，其弟刘兴治则继续“听命杀奴（后金）以自赎。”对于毛文龙更有正确的使用办法。毛文龙原以都司援朝鲜，后留在辽东，在皮岛驻扎，明朝廷任为总兵。皮岛在辽宁省南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东北望朝鲜，与登州连接，正好掇后金之背，毛不失为辽事全局中的一支牵制力量。但毛文龙也有不少问题，“其本人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孙承宗将他作为对付后金全盘中的一个环节，还是团结他，令其发挥一定的作用。

相比之下，袁崇焕尚有一些不足之处。在廷对中，他对崇祯说：“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这是在打包票。事后有人问他五年的方略是什么，他说是随口一说而已，显得颇为轻率。对下，他不大善于团结人，与满桂不对头。更大的问题，一是天启六年在努尔哈赤受伤而死时，他趁派使前去吊唁的机会，与后金谈和。这样的大事，不经请示，擅自决定而行。事后奏报，“优诏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但这一举动，使后金趁机得以“大兴兵渡鸭绿江南讨”，将朝鲜征服了。使明朝失去了一个助手，实是失算。另一件大事，便是擅自斩杀毛文龙。有的说毛有私通后金的嫌疑，其实并不能成立。在袁问斩时历数毛的十二条罪状中，并没有说毛通敌之事，就是明证。原来他在来辽东之前，就对大学士钱锡龙说：对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这种先入为主的见解，显然是不可取的。他事后向崇祯报告后，“帝骤闻，意殊骇，念即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这两件大事，对眼前的战局有很大不利影响，也为他自己尔后杀身的冤狱制造了条件。

斩杀毛文龙使“岛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甫三月”，即崇祯二年（1629年）冬十月，后金皇太极即率数十万大军分道从山海关以西的龙井关、大安口，进入长城，向北京推进。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急忙入援，驰行三昼夜，“十一月四日战于遵化，中流矢阵亡，一军尽殁。”袁崇焕得到后金兵入长城的消息，督师入卫。但他对后金兵不是追击，而是“率兵蹶之”，即跟踪，打算至京城下再决战。当时有副总兵周文郁就进谏说：“大兵宜趋敌（即将敌赶跑），不宜入都。”袁不听。当时风传“崇焕道（导）建州兵入内地，而崇焕不知也。”结果他的兵“甫抵左安门，建州兵亦抵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敌，上不能无心动。”（有他之前与后金的谈和作“铺垫”，这种谣言便使他陷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窘境。）十一月初，京师戒严，危急时刻，又从高阳召回致仕的孙承宗，授予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令其督兵御敌。孙到后，崇祯匆匆召对于平台，他即连夜巡视城防，部署防务。次日夜半，又传旨令其守通州。孙承宗即率二十七骑出东便门，沿途历经艰险，亡失三骑。到通州后，

立即调动人马，派尤岱、刘国柱率兵五千，调密云兵三千、保定兵五千前去救援京城。

袁崇焕与建州兵战于广渠门。满桂与建州兵战于德胜门，满桂负伤，即开城令其部进入城内。旋召满桂、袁崇焕、祖大寿等陛见。袁崇焕请也如满桂例，允其部队入城，崇祯不允，实际此时崇祯已完全不信任他了。尔后，辽东诸军在孙承宗所遣援军的配合下，经过殊死搏斗，才将建州兵击退，京师解围。十二月初一，崇祯又召见袁崇焕、祖大寿等，这次是向袁崇焕问罪开刀了，劈头就是：“上问以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崇焕不能答，遂下锦衣狱。”次年八月即将袁崇焕磔杀，兄弟妻子流三千里，“天下冤之。”但将袁下狱，使祖大寿害怕了，即于十二月四日率一万五千人东溃，远近大震。幸赖孙承宗派人持手书慰藉，祖大寿才心安。崇祯即命孙承宗前去辽东镇守。这是他第二次督辽，他到后，“人心始定。”之后，“大寿开诚与语，即日列其所统步骑三万于教场，行誓师礼，群疑尽释。”旋即挥师次第收复了为建州兵占领的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转战三百里，斩获甚众。”建州兵退出长城以外，孙承宗加紧整顿防务，局面得到稳定。崇祯加孙承宗太傅，孙力辞不受。崇祯四年（1631年），孙承宗下令修复锦州屏障重镇大凌河城，刚刚完工，建州兵前来围困，孙承宗亲到锦州组织力量援救。但辽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很不得力，被围三个月，“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城复被毁。”廷臣认为筑城失策，“交章论禾嘉及承宗”，承宗遂连疏引疾辞职，同年十一月获准回乡。言者又追论他丧师辱国，夺官闲住。

崇祯十一年（1638年），已经称大清皇帝的皇太极又率大兵进入长城，长驱直入内地。已为平民的孙承宗虽无守土之责，仍不肯躲避，而是督率家人修缮高阳城，准备迎敌。十一月九日，清兵围攻高阳，孙承宗率家人拒守，但因众寡悬殊，次日城陷，其子五，从子一，孙五，从孙六，全部壮烈战死，全家被害四十余口，仅幸存一孙，得以延续香火。孙承宗被俘，坚贞不屈，望阙叩头，投缳而死，年七十六。举家为国捐躯者，举世无二。

从以上简述孙承宗、袁崇焕一生主要事迹来看，其共同点是，原来都是文官，他们本来可以在朝中坐而论道，以其文才为国服务效力。但目睹强敌压境、国事危急的形势，便毅然习悉兵事，奋勇走出朝堂，顶风霜，冒锋镝，统兵作战，拼杀在御敌救国的最前线，这就是历史上羡称的儒将风范。这种不计个人安危生死，一心救国卫民的忠心，可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带砺。他们最后献出了自己以至全家的宝贵生命，因而是惊天动地、万古不磨的民族英雄。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诸史册，为人民世代所敬仰。

两位民族英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孙承宗是上级、是先生、引路人；袁崇焕是下级、学生、追随者。这从孙承宗给袁崇焕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与尔筹边再阅年，东西烽火尚依然。……知君定发黄公略，自昔王师贵万全。



诗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和对袁的期望与勉励。说明爱国者有着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语言与策略。孙承宗在辽东运用新战略开创了新局面，袁崇焕则“因之”而不改，继续贯彻执行。当袁崇焕下狱之际，孙承宗曾写诗为其失误表示过惋惜，同时也为他的蒙冤而鸣不平。其中“练尔多方练未成，空闻曾铄尔前生。”“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可以看出孙对袁的感情之深，可以想象，孙承宗一定在军马倥偬之际进过拯救之言，怎奈自作聪明的崇祯皇帝听不进去，一意孤行，以致形成千古冤狱，千古遗恨。

自古忠奸不两立，而忠常毁于奸；还有一些人自己不肯任事，却专门对任事者多方掣肘，有功则妒，造谣生事，稍有小过，立即拆台以至落井下石。对于权奸阉党魏忠贤，袁崇焕在辽东不得已也为之建了生祠，原想委曲求全，却未曾得全，以致一度罢归。不是不久崇祯登基杀魏，怕是就被剥夺了继续立功辽东的机会。孙承宗则无论在朝、在辽东任事，还是在家为民，都对阉党持摒弃态度，使之无可奈何。不过，他两次督辽，都是因小故而被黜归乡里，不得竟全功，使明朝失去一大支柱。明朝之亡，此亦一大关键。

但是，从清朝到今天，说到明末辽东抗清的英雄人物，人们大多知道有个英雄袁崇焕，却很少知道他的上级和老师孙承宗。其原因何在呢？这就要看历史的记叙和评论，以及当政者的作为了。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大多不会完全客观和公允。一般是有利于己者则强调之、夸大之；不利于己者则淡出之以至抹煞之。实事求是，谈何容易！《明史》是清朝大臣张廷玉等撰写的，他们必然是，也不敢不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判定是非善恶、权衡利弊重轻的。袁崇焕是崇祯杀的，为了突显崇祯的昏庸和失误，就必须加重袁崇焕的分量和作用。孙承宗及其家族是清兵屠杀的，为了淡化这件事情（淡化清廷的暴虐和狭隘），就有意降低孙承宗的功勋和作用。《明史·孙承宗传》是这样评说他的：“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这是有意贬低）；而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这是不得不说的实话）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这是说清之兴是因其“有德”，有德则天命、气运所归，非人力所能左右。这里贬低了孙承宗的作用，当然更不能许之为英雄，却笔锋一转，而为屠杀者大唱赞歌。反观《明史·袁崇焕传》中则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决矣！”字数不多，却有千钧之力。其实，袁死之后，孙承宗不是又任辽东主帅了吗？何谓无人？这是违背事实的评断。

不仅如此，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更颁诏为袁崇焕平反，并在广渠门为之建立祠堂。这就昭告天下，应该公开歌颂了，其影响越来越大，直到清末，康有为还为袁祠写了多幅歌颂的楹联和诗篇。如果说乾隆此举，是他的英明和有远见，反映了广大人民心声的话，对比孙承宗就太过冷清和不公了。清廷没有明令褒扬他，没有为他立祠。他和他的家族是惨遭清兵屠戮的，试问在有清一代，谁还敢歌颂这位民